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205,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00册

ISBN7-218-00142-4/K·26

定价 2.20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追忆“马列主义行动团”……………杨康华（1）
- 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情况……………金 阳（25）
- 琼崖纵队第五总队的战斗历程（上）……………陈武英 潘江汉（82）
- 我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地下工作经历（下）……………黄清宇（72）
- 围绕着解放广州进行的资料斗争
——香港《经济导报》在广州开展资料工作的情况
……………林 铃（98）
- 原九龙海关起义回忆录……………李国安（104）

专题资料

- 周恩来与琼崖革命……………吴基林（114）
- 花县农民自卫军始末……………周满华（129）
- 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对武装斗争
的认识及其实践……………陈弘君（150）
- 东江革命根据地简介……………陈万安 王一帆 姚传远（182）
- 抗战前夕的广州民众歌咏团……………黄穗生（199）

人物传记

- 杨善集传……………中共琼海县委党史办公室（210）
- 叶季壮传……………林仙凤 胡提春（281）

问题考证

- 厦门早期党团组织归属问题探讨……………黄坤盛（271）
- “汤坑战役”应正名为“汾水战役”……………谢伯良 陈思明（278）

追忆“马列主义行动团”

杨康华

马列主义行动团，是由中山大学李群杰等追求革命的学生发起组成的秘密左翼团体。李群杰是云南纳西族人，1927年在云南丽江中学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与和荣先、杨子仁、和柳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学组织“新丽读书会”，共同阅读《新青年》杂志、《独秀文集》、《胡适文集》及鲁迅的《呐喊》等名著，定期交流学习心得。这是丽江纳西族青年中第一个进步组织。以后群杰到北平民国大学读书，进一步受到中共党员黄松龄教授的启发诱导，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1982年秋来广州就读于中山大学，一心倾向党倾向革命，积极设法找党。他同广东、江西、云南、湖南等省同学多方接触，共同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经过较长时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真酝酿，他和一批志向相投的同学于1985年9、10月间在白云山摩星岭成立了“马列主义行动团”。其宗旨是：信奉和宣传马列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卖国的反动统治，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从斗争中找党的关系，为中国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36年2、3月间该组织得到中共老党员陈勉恕的直接领导，被认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从而使其在中大及校外陆续有所发展。大部分成员于1937年初至“七七”抗战爆发前后入了党，这个团体亦随之消解了。

一 血荐轩辕的决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中山大学为首的广州各校学生激于义愤，掀起了反侵略的“反日运动”怒潮，同工人、妇女、教育、文化各界联合举行了多次请愿示威游行，要求对日绝交，出兵抗战，收复失地，抵制日货。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规模越来越大。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各反蒋派系的代表人物，早已在当年夏天云集广州，为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反对囚禁胡汉民，成立了“西南政府”，同南京分庭抗礼。他们为争夺地盘和在中央分赃，标榜“反蒋抗日”，但其本质也是反共反人民的。10月10日晚，广州各界群众作反日提灯游行。散队后，群众和中大学生在永汉路（今北京路）检查并焚烧了“新世界”商店日货。该店老板杜煊泰（永汉警察分局局长）恃势抓人，激起公愤，群众包围分局并要求放人。陈济棠派出警察、保安队，进行镇压。爱国同胞伤亡枕藉，被捕甚多，演成“永汉惨案”（亦称“双十惨案”）。翌晨，中大同学紧急集会，列队游行，高举血衣作红旗，高呼“枪毙杜煊泰！”突破军警重重防线，冲到“西南政府”请愿，并联合各界反日会提出惩凶、放人、抚恤，及保障爱国权利等要求。当局软硬兼施，把群众斗争压到地下去。岁末，蒋介石滥捕爱国学生，在珍珠桥畔屠杀全国各地赴京请愿同学，血染大道通衢，浮尸秦淮河上，白色恐怖遍于国中。“一·二八”淞沪抗战军兴，人民振奋，

奔走呼号，全力支援。蒋汪南京政府口称“长期抵抗”，实则进行叛卖勾当，终于在5月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政权对日屈膝投降，对抗战军民进行高压，对苏区连续进行疯狂军事“围剿”，对白区实行残酷文化“围剿”。同胞在流血，大地在呻吟，祖国在哭泣！

在这国难日亟、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中国往何处去？青年学生往何处去？明哲保身、莫谈国事者有之；悲观失望、迷惘颓唐者有之；愤世嫉俗、不知所可者有之；安份守己、埋头书卷者有之；纸醉金迷、趋炎附势者有之。但是，青年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他们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革命传统，不少人抱着血荐轩辕的决心，锐意找寻救国救民的途径，要从荆棘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拯救苦难的母亲——祖国。广州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觉悟的青年学生同爱国主义者组织起来，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的有“中大抗日剧社”、“中大文艺研究会”、“踏绿社”等等，还有各种秘密的小团体和读书会，公演抗日和进步话剧，出版《新启蒙》、《世界情势》、《天皇星》、《广州文艺》等刊物，阅读革命文件、书籍、报刊，举行革命问题讨论会，印刷与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在风雨如晦的漫漫长夜中，这些在党影响下点燃的革命星火吓慌了敌人，却推动了许多寻求政治出路的群众奋勇向前。其时，中大高中部几个十六、七岁的同学黄云耀、李燕胜、虞焕章（即杨康华）、乔右文、谈荣森等人，曾分别受过进步教师崔真吾、张海鳌、陈此生和许杰的影响，经过参加“反日运动”激烈斗争的洗礼，都加入了“中大文艺研究会”（黄、虞、谈三人还担任了该会的干事），同已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凌伯骥、赖寅傲等合作，也同“抗日剧社”主要成员吴丞华、李克筠、肖宜越、黄志潜、邓克强等有所接触，但对马克思主义还不懂得。我们爱国，要救

国，但应怎么办？大家在初中念书时，对《总理遗嘱》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印象颇深，敬佩孙中山的为人及其主张。我们当时都认为要救国救民，就得继承孙中山革命精神，去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实行民主，帮助工农，改善民生。1932年夏，燕胜将返加拿大勤助父亲料理店务，黄、李、虞三人经多次讨论，决定组织一个秘密小团体，取名“新中国”，买三枚心形象牙戒指刻上凸型（即 New China 第一个字母结合成图案）及周边，作为徽号及纪念，于夜间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怀着血荐轩辕的决心宣誓：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争取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相约以后发展新成员及秘密通讯办法。赤子的身心全部奉献给您了，祖国啊，母亲！

二 “天火”在燃烧

这几颗渴求改变现实的幼稚心灵，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是反动当局所不容的，要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靠什么力量呢？这个命怎么个革法呢？经过苦思，我们决定找书本研究，同信得过的人交换见解。我们向相熟的图书馆员秘密借阅“禁书”，向进步同学索取秘本，埋头贪婪地阅读，从唯心论的《革命的发展》到易懂的《历史唯物论浅说》，从公开发行的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过去》、《现状》、《未来》到辗转传阅的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从《墨索里尼》到《马克思传》，从市上发售的《生活》周刊到秘密得来的《北方战旗》等等。普罗米修斯偷来的“天火”照亮了人间，进步书刊的“天火”使我们的脑袋瓜逐渐开窍。虔诚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转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

暑期过后，虞、谈等人从高中乙部（理科）转考到法学院政

治系。其时，广州有个名叫“梁心”的“学者”，写了一本《中国必亡论》。我们对此十分愤怒，通过同班朝鲜同学韩泰宙，在他们所办的刊物《韩声》上著文严加驳斥。我们班中有几位外省同学，如李群杰、张箐、曾傅等，都给我们思想认识带来了新的东西。特别是群杰对经济学教授提出公开批评，指出了课本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的谬误，在班内影响很大。我们经多次接触，常常交谈读书和对时事的见解，过从渐密。李群杰为大家开列了一个阅读马列的书目，如：《社会学入门》、《西洋史要》、《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古代社会》、《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哲学之贫困》、《资本论大纲》、《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史的一元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唯物史观》、《思想起源论》、《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和《列宁主义概论》等等。大家千方百计去寻找这些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秘密地交流心得体会。我们还写信给在加拿大的李燕胜，要他购买英文本的“列宁小丛书”寄来研究。大家经过认真钻研，个别交谈或三五成群地秘密讨论，逐渐从不知到知，懂得了革命要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列主义了。张、曾两位把在江西耳闻目睹的土地革命战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红军与白军，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残酷，工农群众的疾苦和斗争等等，活龙活现地给大家作了介绍，更加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天火”在燃烧，照亮了大家的心，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日军吞占热河进窥察冀，爱国军民长城浴血，蒋介石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和“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反动行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合作抗日提出三个条件，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杨杏佛、史量才的被刺杀，鲁迅和白区内左翼文化的战斗，东北义勇军浴血奋战，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

等“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斗争，李、陈、蒋、蔡发动“闽变”组府抗日反蒋，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名发布我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等，激动了人心。这期间，广州连续发生几起不幸事件，“文总”、“社联”、“左联”及“剧联”等革命组织遭受破坏，几十人被捕，负责人温盛刚（中共党员）、谭国标、郑挺秀、凌伯骥、赖寅傲、何仁棠及龚明等壮烈牺牲；“抗日剧社”被取缔，领导骨干李克筠入狱，吴丞华、肖宜越、黄志潜、陆剑声等出走；培正中学教师共产党员陈黄光（即陈再华）被捕从容就义等等。但是，革命者是吓不倒杀不绝的！“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更多的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救国和人民解放，奋不顾身，在血泊中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天火”在燃烧，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不是停留在课堂里、书本上讲革命，而要在行动上为革命作出贡献，从书本和房间里走出来，团结、组织、战斗、找党。

开初，我们分别在何思敬（中共党员）、邓初民（全国“社联”成立时主要负责人）指导下，组成两个马列读书小组，拿起笔杆子，分别在《新宇宙》半月刊（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等在中大主办），李子诵主编的《诚报》副刊，“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共产党员宣侠父、梅龚彬、钱铁如等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香港办的《大众日报》，桂系在香港办的《珠江日报》等报刊上，用李杰夫、圣贤愁、挺进、余卓瑛、黎嗽、严秀娴、谈素娴、余惠娴等笔名写文章。也翻译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以及《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部分章节，在《新宇宙》上登载。此外，还推动一些同学去听马克思主义者何思敬、邓初民等老师授课和讲演，以扩大影响。其时，上海辛垦书店刊行的理论杂志《二十世纪》，在一部分学生中颇有影响，任白戈著的

《政治形态论》被判为“禁书”，克劳什维茨的《战争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以及一批法国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的翻译本等等，也是大家爱读的。任白戈、杨伯恺和王达夫等，大家都知道是革命的；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叶青的反动政治面目当时还未暴露，他叫唤大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要专搞理论宣传，反对革命活动。我们认为他这种主张是错误的。但是，社会系一个冒充进步的教授祝百英却为他大吹法螺，讲他的“光荣历史”（却隐瞒了是叛徒），透露他有个“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乔右文去函索阅，大家一看原来是一套托派纲领。于是就向祝提出质问，并向受蒙蔽的同学做工作，建议大家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批判叶青的文章，看北平出版的“骆驼丛书”，温健公的《哲学概论》等等。在我们集资出版的《学生战线》刊物上，以及在《大众日报》副刊上，“行动团”的同志都写了批判叶青谬论的文章。

形势发展得很快，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长征北上准备直接抗日，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签署“何梅协定”，出卖冀察，这使我们都感到光用笔杆子战斗不够了，必须进一步组织起来直接投身革命活动。其时，我们有些成员趁参加“中大政治考察团”（实为政治系升上四年级同学作毕业前北上游览）之便，到上海找任白戈和到北平找温健公，希望找到党的关系。但都没有碰上，可巧在上海买到一本书，里面登载不少我党的文件，介绍我党的主张、组织原则以及发展党员等情况。返穗后分别在两个小组内研究，要学着干。随后，我们又从外文报刊，如英文的《国际通讯》，日文的《中央公论》等，看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讯息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中共代表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言论。9、10月间，李群

杰（云南，纳西族，政治系四年级），王甲纲（云南，数天系三年级）、张箐（江西，医学院三年级），李驹良（江西，法律系四年级）、曾搏（江西，政治系四年级）及虞焕章（广东，政治系四年级）共六个人，跑到白云山摩星岭上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取名“马列主义行动团”。其意义是要以实际行动为马列主义奋斗终生，不仅要学习和宣传马列理论，而且要按之进行革命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继续积极找党组织，争取参加共产党；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爱国者一道，为反对蒋介石卖国的反动统治，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斗争；通过志同道合的亲友，物色和培养为马列主义奋斗的同志，组成各种形式的秘密小组或个别联系，彼此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开展同各种抗日政治组织的联络，在联合中坚持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最后，一致推举李群杰为马列主义行动团的负责人。随后，虞又邀约一批广东籍同学：农学院的黄云耀，文学院的乔右文，医学院的陈卓雄，法学院的谈荣森、赵宝贤、黄乃正等组成另一个马列主义小组。不久，黄乃正自动退出，农学院的李康寿参加进来了。后来还有一些人参加进来，而且与其他一些青年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教忠中学女子高中部有徐静如（即张逸）、李琼英（即胡明），她们联系着郑希蕴，李静筠，陈坤仪等；在省女师有陈顺燕、简玉璇、虞倩章、黎万欢等；中大附中虞成章也联系一些求进步的同学。从此，我们的“行动团”，成了迎接暴风雨到来勇敢搏击的海燕群中一个小分队。

三 搏击暴风雨的海燕

“何梅协定”让日本攫取了我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蒋介石

于9月10日又发表《中日关系之回转》一文，公开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同意其“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华北政权特殊化”岌岌不可终日，国命民脉危如垒卵。何思敬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在11月下旬写了《悲壮的民族叙事诗》的《序曲：抗战之号召》，刊登在《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和《新宇宙》上，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号召：“这是千钧一发的危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武装起来，抗战起来，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乾坤一掷，乾坤再造”，“整个国民，全体同胞”，“一齐参加神圣的抗战，共同创造历史的前站！”“最后的胜利是必定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这些用心血写成的诗句，字字铿锵，激动人心。真是气吞海岳震撼南天，不啻为中大大学生员工奋起抗日救亡的进军号角！革命的、爱国的师长们如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张农、黎东方等，在“一二·九”运动暴风雨到来之前，向行将为国家民族存亡而拼搏的海燕们做了多少工作啊！我们这个小小分队深深受到教育和激励。何、邓两位老师还分别向“中青”、“突进”等各左翼秘密组织的成员作恳谈，召开过一些主要负责人员的秘密会议，和“力社”负责人国民党左派陈汝棠商讨筹划抗日救亡的行动。“一二·九”消息传来，爱国同学无不热血沸腾，各秘密组织不约而同地到处张贴有关的报纸文章，书写标语，呼吁响应。先进分子在农、文、法等学院先后发起号召一些班级大会，都决定促成全校性班级学生代表会议，进而召开全校学生抗日救国大会。同心相应，同气相求，我们这个分队的成员，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积极协同其他秘密组织成员一致行动。虽然彼此间都还各不知道叫个什么组织，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就自然而然地共同战斗了。11日晚上，我们在法学院的成员由李群杰、李驹良、虞焕章，联同陈铭勋（政四，陈铭枢之弟，“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盟员）等，汇合政三钱兴

(中大“中青”主要负责人)、韩瑶初、钟远蕃等，在法学院宿舍逐房发动参加全院学生大会。12日晨，在大会上李(群杰)、李(驹良)、谈、虞和钟、陈等驳斥了林翼中派和邹鲁派学生的谬论，击溃他们的阻挠破坏，得到广大同学的支持；全院人员即到学校大礼堂和文学院同学汇合。农、理、工各院同学蜂拥而来，不少教职工也相继到会，全校学生抗日救国大会召开了。大会决定下午列队到市区示威游行，并推选农学院张农教授为总领队。下午一时，两千多同学，以及学校的教职员包括一些知名教授和院长等多人，从石碑步行30多里到文明路(今延安路)旧校，汇合医学院和附中高中、初中部及附小队伍共约5000人，途中还有一些教忠、女师等校同学参加进来，浩浩荡荡，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通过市中心经沙基，向盘据沙面的帝国主义势力示威。这次抗日示威游行，是“永汉惨案”后4年多来破题儿第一遭，震动了华南的中心广州，激励了全市学生和各阶层的民气。

从12月13日到30日这半个多月，我们“困”为了同学们学习实弹射击，请陈铭勋、范汝超从广东中区绥靖公署借来步枪数支，在石碑校园内的茶山学习射击。我们“困”还协同各秘密组织作战，联络各校。12月16日抗日会筹委会宣传部会议规定，除一般宣传以外，再组织五个特别队到市内各校宣传，推定霍赐影、钟远蕃、虞焕章、赵君哲、禡万和五人负责，努力争取爱国同学和教职员工的广泛支持，同广东当局在校内外控制抗日救亡运动作斗争。终于在12月30日将把持大会主席团的林翼中派学生赶下台，由曾振声(即曾生)、李康寿、钟远蕃、张凤楼、张万久、陈柏昌等左翼分子和真诚爱国者掌握实权。31日，中大及附中联合外校爱国分子向当局“请愿”抗日，执信、市三中、仲元、庚戌的队伍以及教忠、大中、女师、知用等校的一些同学前来汇合。

我们“行动团”的成员在游行队伍中，也高举了一幅“请愿示威”的横幅，各人手执标语小旗，呐喊着前进。当走到永汉路时，中大文学院进步学生领袖之一的罗宗煌（即罗哲明）跑来告知：请愿代表再增加三个人，即罗、陈铭勋和虞焕章。游行队伍到了“西南政务委员会”面前，铁门深闭，一队士兵持枪隔门相向，我们代表入内交涉，政府要员避而不见。在门外的队伍等得不耐烦了，鼓噪着要冲进去，门内士兵枪头上了刺刀在对峙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代表跑出来，向着队伍高声宣布：当局要员见不到，我们把“请愿”的要求留交他们；抗日救国要靠人民，我们向人民“请愿”去。在一阵愤激的掌声中，队伍离开这警卫森严的衙门，走向大道，与沿途所经的学校同学联系，向群众作宣传。这次向政府“请愿”，变为市内一部分大、中学校爱国学生的联合示威游行，参加者对抗日要依靠谁，得到了现实的教育。

1936年1月初，同学们知道校长邹鲁返穗后将召开大会，向全校学生、员工“训话”。左翼各组织预感到面临着微妙、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准备将“训话”会转为抗日大会。各组织主要负责人分别向何思敬、邓初民老师求教，我们“团”也由群杰专访邓初民，右文与焕章一同拜谒何思敬。何、邓两老师都指出运动要坚持，要扩大团结面，要加强统战工作，不单各左翼秘密组织要密切协同，而且要联合“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要团结一切爱国师生员工，对当局要利用矛盾，要孤立和击破林派的阻挠、破坏，稳定邹派，争取一切可能因素成为助力，以利于运动的发展和深入。这些见解对我们各左翼组织都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团”的成员按此精神开展活动，积极协同各秘密组织进行战斗。

1月6日下午二时，邹鲁在大礼堂的“训话会”召开了。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粉碎了林派以“反邹”来破坏抗日运动的阴谋。

战胜了邹鲁企图控制包办救国工作的妄想。有几个为邹鲁帮腔的院长和教授的讲话都被激愤的同学哄下台来。在情况紧张会场鼎沸的情况下，邓初民老师走上台前庄重表明：坚决支持学生抗日要求，必要的话愿与救国同学一齐流血；但大家应尊重师长联同救国才合乎统一战线原则；校长抗日，我们拥护；反之可以打倒，我们大家都应该欢迎校长来支持领导抗日救国等等。这一席话转变了会场气氛，掌声如雷。全校抗日救国大会正式开始了，通过了重要决议，如：组成以学生代表为主体的全校学生员工抗日救国委员会；联合市内各校在1月9日举行第三次抗日大示威，成立广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抗日宣传队，分赴省内、外各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等等。最后，由校长率领各委员在主席台上向孙中山遗像举手宣誓就职。各左翼组织团结爱国力量，使会议开得很成功，既体现了党的政策，也使抗日救国的正气得到了伸张。

1月9日下午，中大及附校四千多人进入市区，广雅中学全校一千多学生冲出校门赶来汇合，执信、庚戌、仲元、教忠、市三中、市职、女师、知用、女中、大中等校，都组织了或大或小的队伍陆续参加进来，声势越来越大。一万多人的游行队伍，加上市民共约三万人集中在长堤新填地广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曾振声当大会主席，大会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卖国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出兵收复失地。会后又进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六二三路回到大西门时，大分别散队，还有一部分同学要到大东门才解散。当途经广东省教育厅附近时，队伍中一些人叫喊着要到教育厅去质问，要求支持学生抗日运动，不得以放假和封锁校门来阻挠破坏。教育厅官员走避一空。同学们极为愤怒，高喊：“冲进

去！”一拥而上，捣毁了教育厅的门窗玻璃和一些办公用品，并把教育厅的招牌摘取下来，拾回文明路中大高中部操场，以示胜利。这是广东当局压制抗日运动的倒行逆施所迫出来的，同学们出于爱国激情而发生的这一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毕竟授人以柄，被反动当局藉以密谋公开镇压，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市内各校学生要求救国自由的怒火在继续燃烧。1月10日，广雅中学举行抗日大会，被军警包围。中大抗救会闻讯，立即组织同学开校车前往支援，并抓了警察局派去破坏的“侦缉”。当天晚上，我们“团”广东人小组的乔、黄、谈、虞四人，同卓雄约好往谒其五叔陈汝棠。陈为国民党左派，当时在教育厅任军事救护训练处处长。李群杰曾在邓初民家里与之会晤，觉得陈老对抗日赤胆忠心，非一般国民党官员可比。虞倩章在女师写作《军护训练与抗日》一文，得到陈的赞赏，单独相约畅谈两小时。9日大游行时，我曾问陈卓雄，据云“五叔最听赵先生（中共老党员陈勉恕的代号）的话。”我们意识到这是找党的最好线索。彼此一见，陈老即说，许多事情留待以后再谈，现在先商量一个斗争任务：明晨市二中（荔湾附近女校）召开抗日大会，校方把铁门锁了，不让走读生回校同寄宿生汇合，你们能否组织力量前往支援？我等二话没说，五人即连夜返抵石牌，先找到几十个热心同学及校车一辆，尽早先赴市二中相助！并由外省人小组李、曾等找学校“抗救会”钟远蕃，组织三辆校车前往支援。微明，我等即乘车飞驰市二中，和该校校内同学合力斩关夺锁，大开校门，汇集走读生在操场上举行抗日大会。在该校学生领袖梁锦文、莫兰心等宣布开会和讲演后，谈荣森、钟远蕃先后代表中大同学和抗救会致词祝贺，表明为抗日救国团结战斗到底。市二中学生抗日会终于胜利成立了，这又进一步激励了邻近学校学生的救国热情。